

武士之路

日本战略文化及军事走向

阎德学
◎ 编著

武士之路

阎德学
◎ 编著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阎德学◎编著

武士之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士之路/阎德学 编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01-005714-1

I. 武… II. 阎… III. 军事-文化-研究-日本 IV. E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921 号

武士之路

WUSHI ZHI LU

作 者: 阎德学 编著

责任编辑: 林 敏

装帧设计: 鼎盛怡园设计室

版式设计: 鼎盛怡园设计室

出 版: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7-01-005714-1

定 价: 34.00 元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刘宗和

日本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早已为世人所公认。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系统归纳了当今世界上存在的文明，而把日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载体。此说虽然在学术上存在很多争论，但它却给我们研究日本战略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应站在世界和地区的高度来观察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其军事历史文化。我们会发现日本民族血缘和精神上的同质性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日本社会的组织效能尤其是军事组织效能之高在世界史上非常少见，日本军事战略在保守和激变之间的转换之迅速鲜有国家可比，日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伦理道德之模糊浅薄更是国际社会少有。

造成以上诸多特征的原因，就隐含在日本民族内部以及和世界相互作用的历史之中。综观世界各国历史，在欧洲，骑士阶层虽然一度地位显赫，但从未成为国家政治的长期主宰；在亚洲，虽然曾出现过不少军事化的游牧民族一度称霸天下，但为时都不长久。与之相比，由于岛国的地理封闭性，古代日本却走过了上千年的军事化统治道路，即以武士阶级的形成、发展与衰落为主线的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在鲜有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日本政治长期处于自我循环状态——带刀的武士开疆拓土，主宰日本几近七百年，以致在今天日本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中，依然可见不可磨灭的武士精神。作为战略文化重要载



体的军人——武士的行为方式、精神气质，以及规范武士的武士道在日本文明中根植太深，已然于无形之中溶入日本人的思想底层。

军事文化的广泛渗透，影响到日本人在政治经济外交各领域的思维模式。军事统治和战争文化的结晶——竞争成为日本文化的主体。它导致了数百年封建社会的日本内战不止，外扰不断，社会发展缓慢。可是，同样依靠的是竞争精神，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却从一个落后的封建藩邦迅速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千年战车的惯性、领导集团的好战传统、“强兵富国”的国家政策、军事上的“攻势战略”，又使得日本踏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军事文化往往强调胜利，而忽视战争本身的道义是非。这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今天，很多日本人仍在想当初为什么失败，而不是反思错在哪里。军事文化一贯强调“兵势如水”，随机应变，风险决策。而回顾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无不充满投机、赌博和冒险。同时，军事文化作为仅适用于战争领域的主观存在，一旦无限扩大到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缺陷也非常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民族发扬了自强不息的竞争精神，借助美国的力量，另辟蹊径，采取了非军事的、柔性的“经济立国”方略，走“和平国家”道路，经过短短二十余载，一跃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大国梦想的历史夙愿。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日本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行为模式，仍然可处处发现武士文化逻辑的存在。

当前，世界格局的演变正式进入关键时刻，面对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日本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精神又被深深触动，争做“世界大国”又成为执政者的战略目标。在美国的纵容下，在与国内、国际和平力量的较量中，日本的军事力量从无到有、从“有限”到“精干”地武装起来；日本的军事战略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从“专守防

卫”到“海外干预”地发展下去；日美军事同盟也由“从属关系”发展成为“平等伙伴”、从“本土防御”拓展成为“联合行动”，等等。这一切表明，当今日本的战略运筹中，仍在运行着传统的军事文化逻辑。在右翼势力的推动下，日本的武士文化逻辑已不仅仅用于“大富翁”游戏，而要回归到其在日本战略文化中的传统位置——军事安全领域。这一点，才是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的。

《武士之路——日本战略文化及军事走向》是作者在日研究的成果之一，从日本战略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日本问题、研究日本人是一个较新的视野，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值得充分肯定，我们更期待他锲而不舍、更上一层楼，不断攀登新高峰。

2006年5月



导 论

问题的提出

当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时，经常被我们使用的是权力、国家利益和体系结构等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工具，而较少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一国的安全战略。的确，按照新现实主义理论，很容易解释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并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和原因。按照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国家在功能上是追求效用最优化的无差别实体，而效用一般定义为以能力和资源所代表的权力。因此，只要资源和条件许可，国家的行为就是要不断地扩大其能力，以求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取得相对有利的地位。国家的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非历史、非文化的客观变量，如地理、能力、威胁，特别是由物质能力分配而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用新现实主义理论来分析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非常流行，痛快明了，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就日本安全战略问题来说，例如，日本战后渐进地发展军事力量、不时有右翼势力冒出来否定或美化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当前的自民党谋求修改“和平宪法”、日本政府将自卫队派向海外等种种行为举措，依然是承袭着二战以前军国主义的衣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来日本极有可能还要走向侵略战争。为了预防或警告日本不要轻举妄动，就要对日本不停地口诛笔伐，防止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这种分析方法，确实能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共鸣，也满足了一部分人“阿 Q”式的自尊。因为在近代史上中日之间的战争和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中日之间的经济竞争，中国似乎都不曾对日本具有优势，



所以我们太需要一种心理慰藉了，否则中华文明的优秀靠什么来证明呢。日本安全战略的将来走向，似乎也尽在我们预料之中。由我们已知的事实，进行无需太费解的推理，必然会得出一种看似合理的结论：日本军国主义未亡，日本谋求军事大国之后，还会选择战争。但是，我想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简单的话，那还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吗？如果依据历史事实进行简单地推导，那么，恐怕得出的结论就是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将在我们预期之内选择战争。

罗列历史事实的归纳分析方法，实际上只是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编年史的史料，并不完全能对历史发展线索提供清晰的解读，不能从理论上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要理解历史的具体过程，必须将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不仅要对事物作历史的考察，以揭示其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洞察历史的发展趋势，还需要在考察中作逻辑分析，撇开若干次要的偶然的细节，把握其本质。在认识事物过程中，只有把历史概括与历史过程结合起来，才能既深刻又具体地理解事物。在研究日本安全战略的时候，如果只罗列事实的话，就无法解释战后日本60年和平发展的真相，或许还会由于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发展趋势产生误读与误判，从而导致本可避免的国家间的外交紧张。

那么，我们是否可另辟蹊径，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审视日本的安全战略呢？一个有益的启示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的需要，完成了至今仍然是日本研究者的必读书——《菊与刀》。关于当时美国政府的需要，本尼迪克特写道：“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能够取得哪些指望？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轻率地做出结论，说什



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做，日本人也怎样做。”《菊与刀》最大的启示在于，本尼迪克特成功地从日本文化因素来考虑日本的安全战略，并以此成果作为美国对日政策决策参考因素之一。不过，《菊与刀》中涉及的日本文化因素是否都成为日本战略文化因素，还需要准确定义。

那么，什么是战略文化，如何为其定义？战略文化的提法起自20世纪70年代，斯奈德第一次提出“战略文化”术语。接着，关于战略文化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决定论”和80年代的“工具论”时期，进入了90年代以来的所谓“干预变量”时期，例如，国外有学者认为，由于战略文化根植于最近的经验，而不是历史，因此战略文化是可以变化的；还有的学者注重理论的检验以及与不同理论的对比，如将结构现实主义、官僚组织理论与战略文化论进行对比。在后冷战时期，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为宽广。最具代表的是以彼得·卡赞斯坦为首的学者们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集体著作《国家安全的文化：国际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进一步确认“战略文化”的内容，把行为规范与国家认同视为影响战略决策的决定性变量。^①关于战略文化的定义，本人赞成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即战略文化是指在有关威胁和使用武力问题上，国家行为体所持有的和长期的一套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习惯。根据建构主义关于战略文化的定义，日本防卫大学在开设的战略学课程中，将战略文化定义为“国家或地区在制定和实施安全保障政策过程中所具有的集团性文化与规范”。

日本战略文化的基本构成具体如下：

日本人的灵魂所系——天皇制

探讨日本战略文化，首先必须认真研究分析的就是日本的天皇制了。天皇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日本政治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构成日本战略文化的主体要素。对日本人来说，天皇不仅

① 宫玉振：《西方战略文化：从文化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论坛》，2004年第3期。



是一种象征，它还以等级次序、以上下封闭的纵向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种看不见的束缚。日本人认为，自古至今，日本国家权力性质虽然历经奴隶主政权、封建领主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但其表现方式始终是天皇制，这成为日本人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论据。就连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也说过，一草一木里都存在着天皇制。

天皇制的形成不仅指天皇统治的出现或天皇在统治体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还需伴随建立起一个法制保证的统治体制，对官制和政体运行机制做出明确规定，同时还离不开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

古代天皇制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过程。自第一代神武天皇起直至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均在《古事记》中有过记载。但是，自神武至第十四代仲哀天皇在历史中无法确认，应该是《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为了完成从神代到人代的过渡而虚构出来的人物，而在仲哀天皇与应神天皇中间填充长达 70 年历史的神功皇后，也不能说是实际的存在。因此，有着比较真实存在依据的第十五代应神天皇，应该是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的真正祖先。

第一个使用“天皇”称号的是在 6 世纪末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期间。他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曾引起隋炀帝的怒火。孝德天皇统治的大化年间，改革派发动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大化革新。其后历经三代天皇，大化革新事业才得以完成。之后，日本进入了封建社会，日本天皇制也进入了为期不长的一段鼎盛时期。这一鼎盛时期贯穿奈良时代，直到平安时代中期。自 70 年后的平安时代中期开始，皇室颓废，实权外落到藤原氏手中。号称“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权力被旁人所操纵。自藤原氏政权起，经历平氏政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丰臣政权、江户幕府，天皇无权的状况持续了一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江户幕府灭亡，政权才被奉还于天皇。

在藤原氏摄政，掌握大权之后，天皇始终无法将权力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藤原氏、平氏和丰臣氏三个时期是关白摄政外，其余时期权力都是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但期间，后醍醐天皇曾为夺还大权而努力过，灭亡了镰仓幕府，一度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也造成了南北朝两个天皇同时统治日本的战乱时代。虽然自藤原氏以来，天皇皇权旁落到摄政关白或幕府将军手中，但使天皇的政治地位跌落至谷底的，乃是江户德川幕府。1615年，幕府公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十七条，详细规定了天皇和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法度》明确规定，天皇“以学问为第一”，无须过问国事。凡宫廷官员的任命、天皇公卿的服饰冠带、天皇的出巡等等均需征得幕府的同意。《法度》中惟一保留天皇权力的条文只有第八条：天皇有权按“本朝先规”决定年号。于是，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皇室的权力完全被幕府剥夺。

1853年，培理舰队的到来，敲开了日本闭锁的国门。随着倒幕派的烽起，孝明天皇的去世，德川幕府统治走到了尽头。1868年1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孝明天皇之子睦仁继承皇位，改年号为“明治”，发布“王政复古”诏书。从此，天皇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1868年11月，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将江户改名为东京，开始了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不再是任由列强欺辱的封建小国，其本身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随着日俄战争的最后胜利，日本的野心急速膨胀，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1926年，大正天皇歿，皇太子裕仁登基，改年号“昭和”。昭和时代初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大规模地展开。1931年（昭和6年）秋，“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我国东北。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昭和16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系列战争，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带来地狱般的灾难，同时，日本人民也承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苦难。而昭和天皇裕仁，对于这一系列战争的发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1989年1月7日清晨，昭和天皇去世，前半段伴随着战争的阴影，后半段构建了日本繁荣基础的昭和时代降下帷幕。同日，皇太子明



仁继位，改年号“平成”。

纵览日本天皇制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天皇制是日本传统的历史信仰在中国先进的文化催化下产生的，在古代和近代天皇制中，天皇是现人神，日本是天皇居住的神国，日本人也是半神半人。

逻辑历史学认为：每种独特的历史必然内含独特的历史信仰。历史信仰承诺历史的终极合理性，这种承诺担保历史的终极正义性。不同历史的信仰只是承诺终极信仰方式的不同，不同的历史就是不同的承诺终极信仰的形式。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以逻辑的方式承诺日本历史的终极合理性，并自然推出天皇与神平等立约的结论。神在日本历史中降格为所承诺对象的对象。终极信仰在日本历史中具现为现世的天皇信仰。^①

太阳本是人类的而不只是日本人的光源，但是日本历史在信仰逻辑上，以天皇是天照大神这个太阳神的子孙形式代替太阳本身、代替终极信仰，天皇信仰即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日本以两性一体的现人神天皇代替太阳神，成为日本历史光源的中心。最初的天皇是传达神意于人间的巫师，他们以人的面目把神的话语转达给世人，自身是一个中间性存在者，对世俗世界没有实权。在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传说中，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而有神格性，神以虚拟的血缘流传把神性传达给天皇，现在的天皇接续过去的天皇在流俗时间中传承神性。在血缘上继承了天照大神神格性的天皇，同时继承了它的非神格的人格性。天皇人格性，既不与绝对神的神格相对应，也不是人的精神的人格性。它是天皇神格性的事实性存在方式，天皇实践自己神格性的现世方式。正因为天皇不断超越自己的有限人格性、代表天皇信仰在历史中现世，价值上才有天皇神格的不朽。两性一体的天皇是现世的神与非现世的人统一的现人神。现人神，是日本天皇代代相续的本质。

每个日本人必须以天皇信仰为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观日本历史，

① 查常平：《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www.be-word-art.com.cn.



历代天皇不用说最后是神，而且在各种宗教教派中也不乏教祖神化的文献事实。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是天皇占有神格性、实现神格化的方式。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就是血缘传承的神化。对于个人是家的神化，对于全民是日本国的神化。为了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当然离不开经济活动。一切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指向，一切财富的增长积累的最终价值目的，都是为着生存延续肉体生命。日本历史连绵至今，因为有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神格性的努力。天皇在日本历史中的现世临在，正是天皇人格性的临在，是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为方式的临在。日本国，因为神的栖居而神国化。日本历史，就是天皇信仰为了保持神格性不断更新人格性事物的过程。其历史形式，为人神同一信仰。人的神化与神的人化，一同形成日本历史逻辑的信仰逻辑。日本人所信仰的神，不是惟一神本身而是把自己同神间隔开来的天皇。日本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民族。

在建立了天皇信仰的神国体系之后，还需要建立起法制保证的统治体系，即明确规定官制、政体运行机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而支持古代天皇制的最终形成，是与中国隋唐时代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分不开的。自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改大王为天皇称谓之后，推古朝便通过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度”和《宪法十七条》等维新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大力宣扬王权，从中国的儒家、佛家经典中找到“王权神授”“王道思想”的理论依据，并与日本传统的原始信仰相结合，形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天皇的精神支柱。《宪法十七条》规定了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天皇本人也是神，除了与天照大神有着血统渊源的皇室成员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与皇位无缘。

关于古代天皇制的精神支柱，日本思想史家石田一良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所谓古代帝国的天皇观的意识结构体，打个比方说，则呈现着好像是世界宗教的万神殿一般的光景。似乎可以说，这座万神殿是两层楼的建筑，一楼里，日本固有神道的神，手持《古事记》、《日本书纪》在阐述神孙为君的大王观。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中国的天帝，手持《孝经》和《论语》在阐述有德为君的天

子观。在二楼的另一个房间，印度传来的释迦如来，拿着《金光明经》，在阐述十善为君的国王观。由于神道、佛教、儒教这三教的意识形态的联合及其任务分担，日本的古代帝国和古代天皇受到了护卫。”从此，日本政治便与超越自身基础的宗教世界相结合，致使权力神圣化，天皇万世一主的神圣地位得到了法律保障。

经过大化革新，日本设置了八省百官，建立起完善的行政官僚制度。8世纪初制定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将中国先进的律令制度与日本传统的祭祀制及村体制协调融合之后，最终形成了古代天皇制。在古代日本天皇制的建立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善于学习的长处。当时在中国的影响下，周边一些国家竞相迈入封建文明阶段的门槛。而日本在社会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了善于学习的长处，赶上了东亚新文化的潮流，建立了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社会新秩序。

明治维新后，《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掌握国家的一切最高权力。天皇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日本近代天皇制的三权分立不同于西方国家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而是内阁、议会、军部等各种权力机构各自为政，并直接向天皇负责。

在幕府末期，倒幕运动是打着“王政复古”旗号实现的。所以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为了增强其统治的正统性和有效性，除了不断加强和完善天皇制政权机构、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结构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则重树天皇的形象。只有使天皇神统形象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天皇制新政权才能有战胜政敌和困难的社会基础。日本国学者铃木雅之说道：天下人心若尽皆轻侮天皇，则非一致和睦，如建武以来之大乱是也。稍有轻侮则稍乱。关于重树天皇形象的手段，明治政府首先以天皇名义颁布《五条誓文》，天皇亲自率领群臣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加强了明治国家的构成原理“天赋国权说”的先验主义法制性措施的作用。接着，明治天皇即位之后开始东巡，行幸东京，显示“天皇乃天下之天子”的形象。还有，恢复和改进



古代祭祀制度是树立明治天皇神统形象的又一重要措施。明知政府将正在复兴中的神道变为国家神道，通过祭祀活动，重振天皇是沟通人与神的现人神形象，鼓吹天照大神庇护下的“皇国神运”。自此，神道教的“神国”、“神国一体”等观念被近代以后的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国家神道更把“八紘一宇”、“圣战”等内容作为教义。天皇成为神，成为偶像，万众无一例外都要跪伏于地，为其效命。

(二) 在天皇制的千年发展过程中，天皇大部分时间是“虚君”，不掌握实际的最高权力。

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政体形式经历过天皇亲政、摄政关白政治、院政体制、南北朝和战国时期的二元、三元政治以及幕府将军政治。除了天皇亲政和变相亲政的院政体制和太子摄政体制之外，天皇大部分时期成了“虚君”。其主要原因是神道成为国家宗教，并被确立为一种政治制度。神道主张“神皇一致”、“祭政一致”，天皇被神化，使人们相信天皇是现人神。天皇虽有治理国家的使命，但又不能因具体的繁琐政务而劳神伤智。否则，如果臣属因具体事务让天皇作难，就是对天皇的“不恭”，对神的“亵渎”。在神道的发展过程中，老子道教的无为而治思想对将天皇设为虚君的影响很大。在政治斗争中，鉴于592年崇峻天皇因欲掌权而被大臣所杀的教训，后人多以此为鉴，不主张天皇干政。

而在长达七百年的幕府统治过程中，历代幕府将军需要维护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的神话，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增加将军的权威性。就像中国的皇帝要靠宗教神化自己为“天子”以加强统治一样，幕府将军也要通过“万世一系”的神的后代授予“征夷大将军”称号这种宗教般的仪式，表明幕府政权的合法性和崇高性。“天皇代天神弘天业，幕府佐天朝御天下”。在幕府统治下，天皇只是作为宗教式信仰的象征而存在。

二战后，日本颁布了《日本国宪法》，确立了象征天皇制。新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至此，明治以来的天皇制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天皇的神圣性被彻底否定，由



“神”变成了“人”，丧失了“一国一家”的家长式特性。天皇只被新宪法赋予规定的“国事行为”，成为没有政治实权的国家象征。

（三）当发生事关日本国家命运的关键时期，天皇总是被抬出并发挥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日本国家发展史上，有三个时期事关日本国运。这三个时期的重要标志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三次划时代的改革，即大化改新、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

所谓事关日本国运的三个历史时期，即日本面临强大外来压力的三个重要时期。公元七世纪大化改新时期，日本外来的压力和影响来自中国，来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隋唐封建制帝国。当时的中国不仅有比日本进步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发达的农业经济，而且还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中国要求与周围国家通商贸易，迫使邻国接受中国的“保护”和“封位”，并要求向中国纳贡效忠。当时以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为核心的新政府，一举进行社会大改革，使日本历史出现飞跃式前进。其后，经过天智天皇、天武天皇直至文武天皇采取了诸项措施，不仅在国内确立了古代天皇制，还与中国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全面移植了中国法制、典章以及社会思想，使日本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开始走上全面汉化的封建社会。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面临的外来压力更大，幕藩体制腐朽之极，日本陷入全面的内外交困时期。而此时，长期以来受到幕府冷落的天皇和朝廷，则成为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注目的中心，“尊王攘夷”思想几乎囊括了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成为最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的思想。由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贵族和大商人出身的开明政治家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主要代表人物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高杉晋作、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坂本龙马、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等等，打着“王政复古”的旗号，树立了天皇神统的形象，建立和完善了一元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实行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促使日本建立起近代化经济体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的资本主义统治。由于明



治宪法赋予了天皇是最高统帅、陆海军大元帅，拥有统率军队的大权，不仅天皇和皇族都军人化了，日本的军队也成为“皇军”，要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天皇大元帅的统率，一心一意为天皇卖命。天皇成了日本军队的灵魂。

战后改革时期，日本面临的压力是美国占领军强加的，必须执行占领军的命令。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和监督下，日本历届政府继续着资产阶级的改革，确立了象征天皇制这种资产阶级政党内阁制政体，保留了天皇。

在日本战后初期，天皇制的存废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美国最终允许日本保留了天皇。其主要原因，我们可参考当时美驻日大使、后任副国务卿格鲁的观点。就保留日本天皇，格鲁的观点是：（1）根据长期的对日经验，确信天皇是和平和秩序的象征；（2）能够使日本结束战争的人物只有天皇；（3）消灭在中国大陆和南方诸地区的大约 300 万日军，需要进行长期的且大量牺牲的战斗才能实现，而若让天皇发布诏敕，命令日军放下武器，就能拯救数十万美军士兵的生命；（4）若声明废除天皇制，则会招致日本人的仇恨心，即使占领日本也会发生混乱；（5）日本不可能实行民主主义，它既不适应于日本，又无良好的机能。格鲁的观点被美国政府采纳。美国政府和盟军总司令希望保留没有权力而有权威的天皇，对日实行“间接统治”。麦克阿瑟保护天皇的主要措施是促使天皇自动走下神坛，由“神”变成人，以缓和严厉的国际舆论，同时竭力淡化天皇的战争责任。不过，昭和天皇本人也曾对麦克阿瑟表示过要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在 1946 年 1 月 1 日，日本公布了昭和天皇以诏书形式发布的《人的宣言》，在天皇发展史上第一次向日本国民申明天皇是人不是神。之后不久，昭和天皇便开始进行亲近国民的地方巡视活动，获得了日本国民的敬仰和好感，激励了日本国民努力工作重建家园，显示了天皇制在日本民众中的威望。

经过战后 60 年的和平发展，日本国民对天皇和皇室的感情成为战后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在日本社会的主体——中产阶层看来，象征天皇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今天，